

協和台灣叢刊34

# 台灣鄒族語典

聶甫斯基/著 ■ 白嗣宏、李福清、浦忠成/譯



✧ 臺原出版社

H26

N556

# 台灣鄒族語典



Wt651 / 24 04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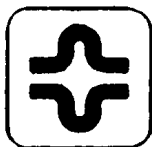
##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鄒族語典／聶甫斯基著；白嗣宏，李福清，  
浦忠成譯。——第一版。——台北市：臺原出版  
：吳氏總經銷，民82  
面； 公分。--(協和台灣叢刊：34)  
ISBN 957-9261-41-5 (平裝)

1 鄒語

802 995

82003947



●協和台灣叢刊 34 ●

### 台灣鄒族語典

原著／聶甫斯基

譯者／白嗣宏・李福清・浦忠成

責任編輯／李志芬

校對／鄭淑麗・李福清・浦忠成・詹慧玲

發行人／林經甫（勁仲）

總編輯／劉遵月

執行主編／詹慧玲

編輯／李志芬・蔡培慧

美術編輯／呂光明

出版發行／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臺原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85巷5號（協和醫院地下室）

電話／(02)5072222

郵政劃撥／1264701~8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四三五六號

法律顧問／許森貴律師

地址／台北市長安西路246號4樓

印刷／細胞核設計有限公司

電話／(02)9333818

總經銷／吳氏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3樓之1

電話／(02)3034150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第一版第一刷／一九九三年（民八二）七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H26

N556

# 台灣鄒族語典



Wt651 / 24 04755

---

本書特獻給二位不同國籍  
卻同樣曾為鄒族語文傳遞貢獻心力的  
俄國學者聶甫斯基 (N.A. Nevskij) 和  
阿里山鄒族的矢田一生 (uonʔ jataujonana) 先生

# 讓傳統文化立足世界舞台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林經南 勸仲

這是一種相當難得且奇特的經驗，四十歲之前，許多人常會問我的，總是一些生理與醫療方面的問題；四十歲之後，我最常思考的卻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如此南轅北轍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我的經驗法則：跟每一位成長在戰後的一代相仿，自童年長至青年，無論是家庭、學校或者是整個社會給我的壓力，只是讀書、考試，考試、讀書；而我一直也沒讓人失望，唸完醫學院後，順利負笈英國，接着又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及台灣擔任過許多人欽羨的婦產科醫生，也正因此，讓我有太多機會在世界各地認識不同的友人。然而，這樣的機會卻總讓我感到自卑，這自卑並非來自專業知識，而是每每交換及不同的文化經驗時，少數識得台灣的友人，也僅知道這個海島擁有七百億的外匯存底而已。

這個殘酷的事實，逼着我不得不慎重的思考：什麼樣的文化，才足以代表台灣？

●  
一九八三年間，我結束了在美的醫療工作，回台全力投注於協和婦幼醫院的經管，由於業務的需要，常有機會到日本去，有一次在橫濱的一家古董店裡，發覺了十幾尊傳統布袋戲偶，讓我突然勾起兒時在台南勝利戲院，坐在長排椅的椅背上看內台布袋戲的情景；不久



後，在大阪天理大學附設的博物館，看到那尊清乾隆年間的戲神田都元帥以及古色古香的「六角棚」戲台，還有那些皮影、傀儡、木雕、銀器、刺繡與原住民族的工藝品，讓我產生極大的感動，忍不住當場流下眼淚。

我的感動來自於那些代表先民智慧與工藝水平的器物之美；忍不住掉下的眼淚，則是因為這些製作精巧，具有歷史意義又代表傳統文化精華的東西，在這外邦受到最慎重的收藏與保護，但在當時的台灣，除了某些唯利是圖的古董商外，根本乏人理會！

除了感動，同時也讓我感受到日本文化侵略的危機，這種危機感也許可溯自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參加基督教醫療協會，到信義、仁愛、望洋等山地部落，從事公共衛生的醫療服務時，便深刻體會到日治時期對台灣山地的積極教育，讓日本文化、語言以及民族性都紮下不錯的根基，其深厚的程度甚至令人驚駭，只是當時的情況，個人並無力改變什麼。及至一九八〇年前後，我結束學業，回到台灣後，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彰化教育學院的郭惠二教授，試圖回到山地經管一個模範村的計劃，結果模範村計劃因故流產，而那次再回山地，讓我不敢置信的是，由於電視進入山區，使得原住民族的文化幾近完全流失，少數保存下來的，卻是日治時期的文化遺產。

這是多麼可怕的文化侵略啊！難道連日本人走了，都還能予取予求地用區區的金錢，換取我們最珍貴的傳統文化？

如此揉合着感動、迷惑又驚駭的心情，讓我在東京坐立難安，隔天，便毫不考慮地到橫濱那家古董店買回店中所有的布袋戲偶，同時又透過種種關係，買回「哈哈笑」劇團最早那個被台灣古董商騙賣到日本的戲棚。

那絕不只是一時的衝動而已，我很清楚地告訴自己，只要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將盡可能地尋回這些流落在外的文化財產；這些年來，雖沒有明確的收藏計劃，但只要有價值的東西，我都不肯放棄，至今，也才稍可談得上規模。



嚴格說來，我是個典型受西式教育的人，加上長年在國外的關係，

讓我對藝術或者文化，都懷有較深且闊的世界觀。

最早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便跑遍了歐洲重要的美術館，後來每次出國，只要有機會，決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可觀的現代藝術館。

除了參觀與欣賞，我也嚐試着收藏一些美術的東西，收藏的目的，除因個人的喜好，當然也因為美好的藝術品也是不分國界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在這傳統與現代之間，必有無法調和的衝突之處，我又如何面對呢？其實，我從不認為這兩者之間會有相互矛盾或衝突之處，任何一種藝術品都有其共通之美，而其中蘊含的不同文化特色，正足代表那個民族的特殊之處，傳統的彩繪與現代美術作品，正是兩類截然不同的作品，正因其不同，我們才能在彩繪中，體認先民的精神與生活狀態，它的價值，除了美之外，更在於它所蘊含的特殊文化表徵。

當然，時代的快速進步之下，傳統的美術、工藝與文化，面臨了難以持續的大難題，導致這個問題的因素頗多，例如政府政策的不當、教育的偏頗以及社會的畸型發展，讓戰後的台灣人擁有最好的知識教育，卻完全缺乏生活教育，終造成今天這個以金錢論成敗，從不考慮精神生活的社會型態。

過去，也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對這個病態的社會提出不少頗有見地的意見，但我一直認為，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必要擁有正常的文化。台灣光復以來，政府當局全力追求經濟建設的成長，卻不顧文化水平一直在原地踏步，直到近幾年，有關單位似乎也較積極地從事文化建設；只是，當中共的廣東省政府，花了兩億美元整修一座五落大厝，成為一座古色古香的廣東地方博物館時，台灣的左營舊城門才剛剛被毀，半毀的麻豆林家也被拆遷，這樣的文化建設又怎能談得上什麼成績呢？

在這種種難題與僵局之下，要重振傳統文化，重新獲得現代人的肯定，甚至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就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與態度，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付出關心與努力，用現代化的方法與現代人的觀點，提昇傳統文化的品質，再締本土文化的光輝。



●  
從開始收藏第一尊布袋戲偶起，彷彿便註定我將走上這條寂寞卻不能後悔的文化之路。

過去那麼多年前，只是默默地收藏一些珍貴的文化財產，我當然知道，光如此是不夠的，但直到今天，時機稍稍成熟，才敢進行下一步的計劃。

這個計劃，大概可分為三個部份，一是成立出版社，二為創立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三則創設臺原傳統戲曲文物館。

臺原出版社成立的目的有二；一是專業台灣風土叢刊的出版，這是一套持續性的計劃，計劃每年分三季出書，每季同時出版五種台灣風土文化的叢書，類別包括：民俗、戲曲、音樂、歷史、工藝、文物、雜俎、原住民族等大類，每本書都將採最精美的設計與印刷，用最通俗的筆法，喚醒正在迷茫與游離中的朋友，讓更多的朋友重新認識本土文化的可貴與迷人之處。我深信，只要持之以恆，所有努力的成績不僅將獲得關愛本土人士的肯定，更將贏得國際間的重視；二為出版基金會的專刊，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成立之後，將有計劃地整理台灣的傳統藝術之美，諸如戲曲之美、偶戲造型以至於建築、彩繪之美……等等。

至於基金會與博物館的創立，則是我最大的目標，這兩個計劃其實是一體的，博物館只是基金會的附屬單位，主要的功用在於展示基金會所收藏的文物與美術品；至於基金會本身，除了推廣與發展本土文化，定期舉辦各種研習營與表演、演講，更將策劃舉辦各種世界性的文物交流展，目的除了讓國人有機會打開更廣闊的視野外，更重要的是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

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不僅是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與出版社努力的目標，更是每個關愛本土文化人士最大的期望，不是嗎？畢竟唯有如此，才能重拾我們失落已久的自尊！

（本文獲選入《一九八九年海峽散文選》）

# 俄國學者與 鄒族結緣

——《台灣鄒族語典》譯者序之一

李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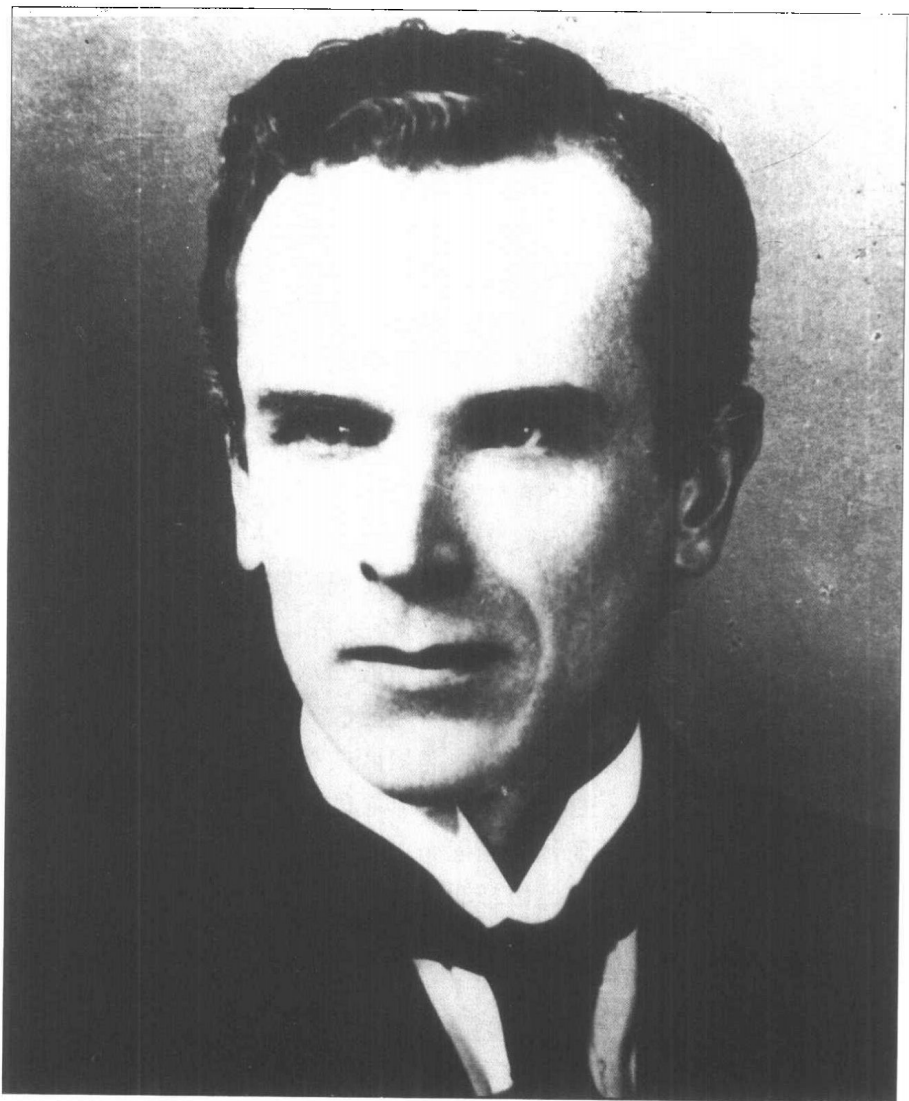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初淡江大學邀請我講學，我預備了幾個題目，其中一個是完全嶄新的題目：〈蘇聯藏關於台灣的資料及台灣研究〉。到過遙遠的台灣的俄國人並不多，但是有幾位建樹不小。一八七五年年輕的海軍軍官伊比斯自費從香港出發去台灣調查平埔及高山諸族。一九〇八年另一個名叫Molthrecht的人從海參崴去台灣調查台灣鳥類及昆蟲。他訪問了鄒族等民族及部落。但是第一個漢學家及日本學家來調查台灣的是一九二七年從日本來的N.A.Nevskij（漢名聶歷山）教授。他來台灣有一個具體的目的——學鄒語，專門研究這個從來沒有人研究的語言。

聶甫斯基一八九二年生於一個古老的城市雅羅斯拉夫爾（Yaroslavl）。這座城市位於俄國最大最有名的一條河——伏爾加河的中流。他的父親是個小官，一個縣裏的檢察員，但是不久聶甫斯基的父母逝世了。親屬把五歲的孤兒送到伏爾加河的另一個城市Rybinsk（漁城），住在外祖母家，並在該城就學，讀完中學。在中學讀書時，小聶甫斯基對外語十分感興趣，不只對當時校裏學的西洋話，他與城裏的韃靼人交友，常常到他們那裏去學韃靼語。他的一個同學（比他大三歲）在莫斯科入了大學學習阿拉伯及波斯語。聶甫斯基乘機學會了阿拉伯文字。但是他同時對技術也有興趣，所以中學畢業之後他考上了彼得堡工業專科學校，但一年之後退學轉讀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中文日

文科。據他的同窗、有名的日本學專家康拉德院士回憶，聶氏特別喜歡語音學。當時該校有幾位著名的語音學教授，建立了一個實驗語音學派。大學附近（幾百步之遙）設有全國有名的民俗博物館。當時在那裏工作的人中有一位著名的民俗學家Sternberg教授。Sternberg教授在求學之時曾參加俄國民意黨的運動，被流放到太平洋庫頁島的最邊遠地區。他在那裏住達六年之久，學會了當地少數民族giliak族語言，搜集了很多民俗學材料。一九一一年聶氏開始學中文及日文。Sternberg教授在民俗博物館開了一個非正式的實習班。他說，爲了當一名民俗學家要記住兩個條件：1. 深入研究民族生活。不要從旁觀察一個民族的生活；2. 一定要學會該民族的語言。二十世紀初大多數西方民族學家去某個國家調查民俗都通過翻譯，住很短時期。Sternberg的經驗及他的觀點對年輕的聶甫斯基有很大影響。在列寧格勒一座公墓裏葬着Sternberg，每當我去爲父母掃墓時總要經過他的墳，他的石碑上雕一個石球（象徵地球），球上刻着：「人類是一個整體」，意思是全世界民族都是同等的，沒有文明與不文明之分，都有自己的歷史及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明，每個部落都有自己值得受到尊敬的文化。這是Sternberg的原則，在當時堪稱十分進步。

Sternberg在庫頁島也見過愛奴（大部份住在日本的少數民族），對愛奴民俗有了興趣，對台灣也有了興趣。他在幾篇文章裏提到高山族的一個風俗，據德國Joest一八八二年寫高山族常把圖騰野獸放在籠子裏養着（原來西伯利亞有的民族也是這樣做的）。我看到現在很多鄒族在籠子裏養狗，很奇怪，但看了Sternberg的文章想到，是不是源於古代在籠子裏供養圖騰動物的習俗？

在大學求學期間，聶甫斯基也曾深入研究中國文學。一九一三年畢業時的論文取題〈李白十五首詩的翻譯與研究〉。他的老師是有名的俄國大漢學家V. Alexeev阿列克塞耶夫教授，對他的評價很高，後來他寫道：「他這篇論文的題目要求對李白最難懂的詩進行詩學分析。他很成功地處理了這個題目。他借助《佩文韻府》，在學生中也是空前的，表現出他那獨特的善於搞清楚難懂文本的本領」。畢業之後大學留他讀碩士，他自願學日本平安時期的文學。一九一五年校方派他到日



●青年時期的聶甫斯基。

本進修，那時已有兩名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的畢業生在日本進修，一名專門攻讀佛教，另一名研究日本漢學（中國文化、文學、語言對日本的影響）。聶甫斯基選擇了日本的神道，他一面讀神道的經典及注解，一面自己調查神道廟各地風俗、儀式、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民間遊

戲、巫術，他想通過這些民俗的材料來研究日本土地的古代風俗信仰。很快他明白了，大眾正在忘卻古老的風俗，「只有在偏遙的窮鄉僻壤可以找到某些幾乎原封不動的日本生活，」他寫道。一九一六年夏，聶甫斯基進行第一次考察旅行，去日本的東北省。一九一七年俄國鬧十月革命之後，他的學期滿了，大學不寄錢來，但回國也沒有出路，於是他去找工作。在東京工作兩年之後遷到北海道，在一所商業學院教俄語。同時他碰到他老師Sternberg常常提到的愛奴族。Sternberg曾說過愛奴族原來是很大的一個謎。他想愛奴族是在南方從太平洋島嶼上遷來的。聶甫斯基開始學愛奴語，搜集愛奴神話故事、民歌。他學的相當好，三年之後京都大學邀請這位俄國學者教授愛奴語。他搜集的材料有一部份在日本發表；有的於三〇年代在俄國發表；大部份發表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愛奴民間文學》。

一九二二年他搬到大阪市，在大阪外語學院開始教俄語。那時他對宮古島有了興趣，因為宮古島保存了不少古日語成份及古老的風俗、故事。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八年的暑假他去宮古島搜集材料，一部份立即在日本《民俗》雜誌發表，大部份只有在一九七八年莫斯科出版的他的遺著《宮古島民間文學》一書發表。

聶甫斯基早就寫過，他希望「找到神話的發祥地，即國內的神話中心，從而確定神話地域發展的進程……找到這些中心以後，通過參照日本同外國交往史的研究，也許能有助於找到這些神話的發祥地，從而揭示日本民族本身發祥的情況，或者至少可以揭示日本人民的古代歷史。」他訪問了北海道、琉球，一九二七年去台灣。這都是他的老師Sternberg認為的大約是古代愛奴的遷徙路線。

一九二七年六月，聶甫斯基和日本民俗學家淺井惠倫一起去台灣。淺井惠倫教授要調查泰雅一支Sedik部落。聶甫斯基要考察鄒人，學習鄒語、搜集民間文學。他們先到基隆，然後去台北，得到日本總督的許可證，坐火車去山裏。淺井先下車；聶甫斯基去嘉義，在那裏要坐窄軌火車到十字路，下車之後他去見日本警察官。幾小時之後從山上下來了一個十歲的鄒族小童領他經過特富野村到達邦警察局。第二天日本警察給他介紹了一個鄒族十八、二十歲的小伙子，名叫uogə

jataujojana，日本人叫他矢田一生（矢田是日語jata的寫法，「一生」意思是第一最佳的學生）。當時一生已畢業於日本小學在台南考上了師範學校，大約是三年級的學生，夏天回家（他家在特富野），但他每天來達邦協助老師給鄒族兒童教日語。漢名叫高一生。據聶甫斯基所說他的日語非常好，比聶甫斯基碰到的其他鄒人要好得多。第二天高一生開始教聶甫斯基鄒語。聶甫斯基從高一生那裏記錄了十三個故事，還有兩個故事從他的哥哥pasuja錄得。高一生非常樂意教聶甫斯基。他先請老人們給他講幾個故事，然後他再講給聶甫斯基聽，解釋聶甫斯基不明白的地方。大部份文本是ehohamo，即「故事」。聶甫斯基問高一生鄒族有無民歌；高一生說鄒族只有一個叫majasvi歌曲，這是在慶祝少年成人時唱的歌，但高一生不知其詞。這當然是錯的，因為鄒族與其他民族一樣，有自己的民歌，而且有許多歌謠已經被整理紀錄下來。

高一生幫助俄國學者學鄒語發音、語法及詞彙。聶甫斯基一面記發音，一面學習語法，搜集民間故事及編鄒語辭典。他在北海道及宮古島野外考察的豐富經驗很有用處。他在一個夏季（大約一個多月，七月及八月初）做了那麼多工作！他也搜集鄒族文物，現在聖彼得堡民俗博物館裏的鄒族衣服、裝飾、樂器、武器共三十件，都是聶甫斯基在阿里山搜集到的。

據聶甫斯基說，一九二七年之前有兩位日本學者佐山融吉（一九一五年）和小島由道（一九一八年）曾經考察過鄒族，但他們主要考察民俗，對語言注意不夠。記鄒語用的是日本字母，用熟悉的日本語音觀念代替鄒語觀念。然而日本字無法準確地記錄鄒語詞的發音。況且由於日語發音的特點，日本學者無法體會「B」和「V」、「L」和「R」、「F」和「H」之間的差別。因此可以說，在聶甫斯基到達台灣之前，學術界沒有關於鄒語的準確描述，也沒有用這種語言記錄的文本。

聶甫斯基花了一個多月（天天下雨）從高一生兄弟那裏記錄了十五個故事（後來他向蘇聯科學院報告說記錄了三十個文本，但發表的只有十五個。從俄國東方學家檔案及日本天理大學藏有的他的遺著裏，沒有查到其它鄒語的文本）。回到日本後他在大阪作了報告，介紹

他在阿里山調查的結果。又在日本靜安學社通報〈第一期〉發表了調查報告的摘要。

一九二九年歸國之後，聶甫斯基主要繼續他在日本開始的研究西夏文字（因為俄國藏有全世界最多的西夏文資料），但沒有忘記他在台灣搜集的資料。一九三五他在列寧格勒城由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書，題為《台灣鄒族語典》（N. A. Nevskij: Materialy po govoram jazyka cou. Trudy Instituta Vostokovedenija. X1. Moskva—Leningrad, 1935, pp.136），包括語言（主要是語音）的描述及研究、十五個故事（用拉丁字寫的附有俄文翻譯，每個故事詞彙分析與民俗學分析，同以前日本人記錄的異文比較。）為了準確地表達鄒語的語音，聶甫斯基使用自己的拼音（以國際音標為基礎及拉丁字母），但是一九三五年出版書時用了蘇聯專家於一九三三年制訂的音標，也是以拉丁字母為主。

雖然在回日本之後，一九二八年聶甫斯基整理了他編的《台灣鄒族語典》手稿，但一九三五年出的書序中他說他將來準備編寫《鄒語語法》及出版《鄒語特富野村方言辭典》。

聶甫斯基論述鄒語的專著得到各國學者的高度評價。《台灣鄒族語典》問世之後只過幾個月，日本《東洋史研究》雜誌（一九三五年一卷三號）發表了石濱純太郎先生的書評，詳細的介紹該書的內容，並指出聶甫斯基教授對日本學界研究台灣有多大的啓發：「他論述福爾摩沙語的著作吸引研究印尼學者的注意……他的科學方法對台灣學專家很有啓發」。著名的日本學專家斯·叶利塞耶夫（俄國日本學教授，其人於一九一五年曾以大學生身份到過台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流亡國外）於一九三六年在美國寫道：「聶甫斯基的專著可以作為撰寫描述土著族方言著述的範例。對鮮為人知的語言不熟悉的社會學者和民俗學者來說，文本的譯文可以充作最好的素材。」

可惜的是聶甫斯基無法繼續他的鄒語研究。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他主要整理西夏文書籍和研究西夏文字。一九三五年三月他在科學院大會作了專題報告：〈西夏文字及西夏文書籍情況〉。學術界對這些全新的材料興趣極大，東方學家研究會決定聶甫斯基應當轉向全力



## II. ho-osi-|a pnā-no nia oadimi o-feohi

ine-noanaŋo moso|a ahtu naŋno iŋeti e eniŋa |moso-|ŋo-|a anou toŋotŋ-ta  
 yuwafeofo e eniŋa |moso|a aavaho aŋi yuso na nia |a hie |koŋko mohi-eno-|a  
 naŋno iŋveu e-hpihpŋi |iho-|a akeŋi emoyafo-|a aŋi niyaŋte aŋi mŋoy-no  
 |a-si hiya iŋveuwa |ina-niya-|a papai-he oa-na obe-|a pē|i ŋa |moso|a aŋohti  
 naŋno manŋi na ohe|a siya-i| oani |koŋko oa-moso|a tumzo-no ŋeowa |mohi-|a  
 naŋno atutumzo mohi|a yuteuyunu to kuŋa ho yupeeahŋiŋi-no te-|a  
 hjoa |ukŋa-i| moso-ŋo ahtu maŋpaŋiŋi no-nte imiŋi-|i hioa |hō-miyō pano  
 oho-|a yainiŋa oadimi |oh-si nana yainiŋa |tauweno poa iŋvaho mayi-to niya-|a  
 hioa-si o-hiye |tena-mu-|a ayoti-no tenamu|a oau ho-tena-iŋu-|a feiŋna  
 e-hpihpŋi |mohi aŋiŋi ayoti-no tehe-|a oani na-|ou |ohsi-|u pnā-no iŋŋiŋi-no  
 niya oadimi o-hie |ohsi aŋa hŋayia o-hiye |mohi maŋŋa ettiŋi na-niya  
 hmuy-si i-|moso su'ta iŋeoa |mohi mayiŋa psoeŋe e-eniŋa |moso iyananŋou  
 totoeŋiŋi o-hie |koŋko mohi voetiŋi e-hpihpŋi |osi aŋiŋa-no moso iŋŋi  
 hiye na oŋi pnā-no nia oadimi |koŋko moso maŋŋo tototoeŋiŋi |mohi aomane  
 mohi akeŋi espayo o-hie ho-moso-iŋo osini iŋvaho totoeŋiŋi |mohi huiŋa  
 mohi akeŋi aomane aopaŋto |mohi iŋvaho totoeŋiŋi |mohi ausuŋiŋi noanaŋo  
 aopaŋto |mohi atavey totoeŋiŋi-ta oeiŋi |mohi aŋi mayi-to |asi hjoa  
 mayiŋaŋe |i-na ohsi pnā-no nia oadimi oana moso|a aopaŋto ho|a hiye |si-  
 ho-|a-iŋu yoffina tenna-iŋu aopaŋto |inaŋŋi o-|a-to yayiŋiŋa feohi |i-o-mo  
 kuwaŋa-to tayiŋo-to feohi |iŋŋo na ohsi nana-|a imiŋi-no nia oadimi |.

- 一九三五年於莫斯科出版，聶甫斯基所著的《台灣鄒族語典》部份書稿。

研究東方學研究所的西夏文庫。他除了整理列寧格勒藏的大量西夏文書籍外，還編了世界第一部西夏文字辭。他個人計劃在一九四二年出版三至四千字的《西夏文辭典》。

可惜的很，在蘇聯歷史上最悲哀的一年——一九三七年，在史達林恐怖之下，聶甫斯基及他的日本太太被逮捕，說是日本間諜，很快就被槍斃（很多書說是一九四五年病死的，不對。現在才知道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四日犧牲的）。一九九一年初我去台灣，希望幫助過他的高一生還在人間。可惜高一生只多活了十年，於一九四七年被槍決。

聶甫斯基論述西夏文、愛奴及宮古群島語言和民間文學、日本文學及鄒語著作未能完成。史達林死後，一九五六年聶甫斯基被平反。一九六〇年他的《西夏文辭典》手稿及其他西夏文研究遺著編為兩大冊，由蘇聯東方文獻出版社出版，死後獲得了蘇聯最高的獎金——列寧獎金。該書立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學者在幾種日本刊物上發表文章評聶甫斯基的書，評價非常高。他的書得到最高獎金之後，宮古島報紙發表消息說是聶甫斯基宮古島方言及民俗研究得了獎金。雖然是誤會，但也証明他的宮古島研究也有價值。一九七一年日本出版了一本紀念聶甫斯基的書，題為《月へ不死》，編者岡正雄編入聶甫斯基在各種日本雜誌發表的文章、天理大學圖書館一些手稿及信簡，但是除了《靜安（王國維）學社簡報》發表的簡報外，沒有甚麼關於鄒語的資料。一九七六年加藤九祚教授出版了一本介紹聶甫斯基的書，題為《天の蛇》。一九七二年蘇聯出版了他的遺著《愛奴民間文學》。一九七八他的《宮古群島民間文學》也出版了。同年蘇聯還出版了日本學家L. Gromkovskaja 及漢學家、西夏歷史家E. Kychanov合寫的《聶甫斯基傳》。一九八一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東方讀物編輯室出了聶甫斯基的另一本書題為《鄒語資料、北鄒方言字典》。編者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L. Gromkovskaja在檔案攝製了聶甫斯基編的《鄒語特富野村方言辭典》。我們雖然出版了這部書，但在俄國並不知道聶甫斯基一九二七年調查台灣鄒語之後有無人專門研究鄒語，有無人編鄒語辭典。一九九一年三月到台灣之後我問關於鄒語的情況，接待我的淡江大學中文系說他們有一位鄒族老師，可以與他見面。過幾天我真的見到了阿里山特富野村的浦忠成先生。他是第一個讀博士的鄒族人，要搜集研究鄒族民間文學。他告訴我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聶甫斯基調查鄒語之後整整三十年，有名的語言學家董同龢教授帶了幾名學生王崧興、管東貴（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鄭再發、嚴棉等人去阿里山搜集鄒語資料。一九六四年董同龢教授去世不久，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了一大本英文的書，題為Tung Tung-ho,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Taipei, 1964.（《鄒語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